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沈志华 著

# 冷战的再转型

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沈志华  
著

# 冷战的再转型

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的再转型 / 沈志华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500-3

I. ①冷… II. ①沈…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962号

**冷战的再转型**

---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5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00-3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 1994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 目 录

##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 1

###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 2
-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 8
- 三、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与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 12
-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 17

##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 24

##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 63

### ——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 / 74

- 一、困惑：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 / 75
- 二、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 81
- 三、尴尬：莫斯科不得不为北京提供核保护 / 86
- 四、分歧：中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 93

##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 101

### ——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 一、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 104
- 二、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 111
- 三、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 121

**难以弥合的裂痕 / 130**

——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 一、中印纠葛初起及莫斯科的关注 / 131
- 二、中印冲突升级与苏联的中立态度 / 140
- 三、中苏领导人面对面的激烈争吵 / 148
- 四、中印冲突升级与中苏分歧公开化 / 154

**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 / 166**

- 一、一个现象和两种解释 / 166
- 二、我们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 170
- 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 177

**附录**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 / 182**

**关于中苏两党分歧的俄国档案 / 219**

**关于台湾海峡危机的俄国档案 / 344**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俄国档案 / 358**

**人名译名对照表 / 440**

#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平时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sup>①</sup>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华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

---

<sup>①</sup>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际性的，特别是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1955年1月，苏联国防部提议中苏两国在远东的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中国即派出由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月24日到达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2月6日双方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文件：1、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2、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作演习的实施计划；3、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却无中文本，且中国

根据协定增设的情报机构和增加的通信设施还要用俄文向苏方通报。陈赓等人回国汇报后，彭德怀认为这个防空协定没有按照国际惯例以双方文字体现，因而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暂不批准该协定。<sup>①</sup>

防空协定的搁浅，并不说明中国不愿进行军事合作，应该说，中国在远东防空方面对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苏联。显然是苏联军人在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心态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即使苏方再傲慢的举动（如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等），中国也未提出异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中国军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时，尽管苏联仍是同盟当然的领导者，但中国已经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各国的军事战略时开始显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sup>②</sup>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sup>③</sup>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正式地把中国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2页。笔者2001年6-9月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

②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的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见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1996.*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

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sup>①</sup>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

<sup>①</sup> 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sup>①</sup>

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sup>②</sup>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单方面裁军 64 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sup>③</sup>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sup>④</sup>5月22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月29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3页。

② 参见：Зуб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ё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4;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Хрущёва Н.С.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③ Vojtech 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1949-1956*, Working Paper №3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March 2002, pp.79-83. 由沈志华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卷中刊载了19件有关苏联裁军的档案，其中一些文件反映了苏军下层人员对裁军的抵制和不满。

④ 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页；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pp.81-82.

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sup>①</sup>于是,彭德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sup>②</sup>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

1955年9月,苏联国防部再次提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问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苏方进行商谈。行前,总参谋长粟裕和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谈判仅限于双方在防空情报方面的合作问题。但周赤萍于9月23日到达赤塔后,苏方把已经准备好的协议拿出来要周赤萍签字,其内容包括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议定书还要求中国在东北北部地区增建几个机场,以满足苏军飞机降落之需要。此外,在为对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条件也不对等。因为超出了事前协商的谈判范围,周赤萍便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刘亚楼回电答复:不能同意,应只谈防空情报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复电却是同意按苏方的议定书办,于是9月27日便在防空协定上签了字。周赤萍回国进行汇报时,刘亚楼感到惊诧,彭德怀则愤怒不已,并报告给周恩来。由于中国代表团与国内的往来电报都是经苏军通讯系统传递的,很可能苏联人从中作了手脚。周恩来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睬苏联顾问关于在12月开始执行协定的意见。12月29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例会,会议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投资增建飞机场,并决定告诉苏联总顾问和转告苏联国防部:周赤萍违背总参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两国防空协定上签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受到处分。此协定不能执行。<sup>③</sup>对事情真相调查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苏方提出的协定本身确实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无疑是导致此期中苏在防空领域军事合作未能具体实施的主要原因。

类似这样不平等的做法,并非仅有。例如,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95页。据参加这次谈话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讲,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13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61-63页。

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年5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sup>①</sup>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人在同盟中始终保持着那种领导者的心态，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趋势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1956年1月28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聂荣臻指出，“欧洲和平和亚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sup>②</sup>

中苏关系表面上的变化是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继续全力配合苏联，这主要表现在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同样，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和空前团结，也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苏领导人之间为军事合作问题爆发了一场严重分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sup>③</sup>事件。人们普遍认为，中苏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这场正面冲突是中苏国家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sup>④</sup>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sup>⑤</sup>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9日。

③ 俄文原文 *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共同舰队”的。

④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⑤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27、728页。

觉，行为方式依然如旧。

##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友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即席讲话，真诚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sup>①</sup>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12月14日，中国向苏联提交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中国设想的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sup>②</sup>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几乎是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更值得引人思考的

<sup>①</sup>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0-61页。

<sup>②</sup> 该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专业杂志上，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Washington, D.C., pp.160-161。

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是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这也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

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1958年1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sup>①</sup>2月1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sup>②</sup>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sup>③</sup>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sup>④</sup>4月4日，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sup>⑤</sup>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sup>⑥</sup>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sup>⑦</sup>4月9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倡议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4月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sup>⑧</sup>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21-122页。

② 1958年2月1日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И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9，p.8893，л.10-1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24-125页。

④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WIHP Bulletin*, 1994, Issues 4, p.16.

⑤ Morton H. Halperin, *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 1957-1960*, 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 p.136.

⑥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赫鲁晓夫言论（1958年1-4月）》第8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522页。

⑦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4月7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6-137页。



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苏联方面尚未通知驻华使馆，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2月28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sup>②</sup>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sup>③</sup>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sup>④</sup>

① 1958年5月9日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ЦХСД，5/49/136/8893/77-81。

② 1958年2月28日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00/51/432/6/86-96。不过，关于赫鲁晓夫与刘晓谈话的详细内容，日前在中俄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有反映。

③ 1958年3月9日尤金与朱德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100/51/432/6/97-103。另参见 *Зубок В. Переговоры Хрущёва Н.С.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02。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